

施玮写作历程及“灵性文学”现象的意义

On Shi Wei's Writing History and the Implication of Spiritual Literature

韦元凯

Wei Yuankai

摘要

施玮作为当代一名杰出的海外华文基督徒作家，她在诗歌、小说、散文等各种文学形式上都有着丰硕的成果。近年来她提出了“灵性文学”的概念，起先在诗歌上进行试验，后来又将这一概念运用到小说的写作上，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引起了不少专家学者的关注。为一直默默无闻的基督教文学赢得了无数的掌声，因此她的作品在当代基督教文学上占有重要位置。本文主要讨论其写作的历程以及“灵性文学”对当代文学以及当今社会的意义。

关键词：施玮；灵性文学；基督教文学

ABSTRACT

Shi Wei is one of the outstanding oversea Chinese writers creating fruitful works on many literary forms, including: poem, novel and prose. A few years ago, she first defined spiritual literature theoretically. She first tried to write poem and then also on her novels under this theory. This creative work brought her success. Her works were noticed by scholars in this field and results in encouraging displaying unknown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to the public and got lots of praise. It has been accepted that her works have an important status in Chinese contemporary Christian literature. This text mainly discusses her writing including the history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Spiritual literature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nd today's society.

Keywords : Shi Wei, Christianity literature, Spiritual literature

施玮写作历程

施玮作为当代的一名诗人、作家，她的名字在目前各种文学史著作或教材尚没有提及。因为我们审视与研究文学、社会文化现象等等都被我们现今的文学主流意识形态所主导，因此基督教文学也就很少能进入文人学士还有专家们的“法眼”，从而就失去了进入主流学术视野的机会。“而如果存在中国圣经文学史的话，要想忽略施玮的名字也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卓越的文学成就使得施玮成为了中国圣经文学的开创性和代表性作家。”（季玢. 2010:110）

施玮，1963年这样一位出生于上海的江南才女，如同圣经中的耶稣一样，施玮在现在、过去也有着许多的头衔：诗人、作家、画家、编辑、主持人、博士、技术员、助理、经理、团干、党干、经理、书商、红小兵等等。每一个头衔都见证了她在人生道路上成长的每一步。

施玮可谓是一位出身书香世家的女子，她从小就在祖母的唐诗宋词、母亲的西方童话还有小人书和江南幽怨绵绵的戏曲里面熏陶长大。她对文学的热情之种早就在幼年时期播下。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施玮的首部长篇小说《柔若无骨》中得到印证。在文中作者通过描述方佳瑜叙述其幼年的生活：住在苏州的状元府，由奶奶教读古诗词，“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我就看过了《红楼梦》、《牡丹亭》、《西厢记》，还有许多外国名著编的小人书。”（施玮. 1997:362）同时这也映射了作者的美好幼年生活，因为“我”一直与“奶奶”住在一起，“由此可推想文革初期他们的生活也是很不错的”。（施玮. 1997:227）根据施玮的出生年份计算，施玮正当学龄进入学校的时候也是文革高潮迭起的时候。“但当我被送进学校（也算是离开家庭进入社会后），立刻抛弃了小江南的缠绵，主动投身于革命的大熔炉。”（施玮. 1999:1）就像《柔若无骨》中的王静梅，因为家庭成分原因时常自卑沮丧，为了划清自己与资产阶级家庭的界限，不惜出卖深爱自己的母亲换取建设兵团的军装。施玮确实也是因为自己家庭的原因，好不容易当上了“红小兵”，于是把自己的热情一股脑门儿的投了进去：废寝忘食研读“红宝书”、把幼小时打下的扎实的文学基础转换为成为无产阶级的工具。“从小学为老师同学写大小字报，到中学出黑板报写广播稿。”（施玮. 1999:1）因此也换来了“团干部”、“当宣传委干事”等职位。热烈的革命激情和对毛

主席著作的热爱使她决心做个“红色的革命接班人”，工作后自己掏腰包报读了成人自学高考党政系。

1989年施玮在所谓的“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她和许多文人、大学生一样经历了理想的破灭。自己的生命受到了世事、人情的重创：被警察审问、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被停薪留职、被爱人抛弃、与父亲冷战、被怀疑监守自盗等等，因此她的革命热情被浇灭了，曾经高举的“真理”也杳无踪影了，一切的标准也模糊了。“我最痛心的是‘真理’仿佛已经死亡，对光明的追求变得遥不可及”。（施玮. 1999:29）然而在这“真理”死亡的黑暗时期，她结束了北京鲁迅文学院的学习，来到上海复旦大学，成为复旦大学中文系第一届作家班学员。这期间，她开始在《诗刊》1989年的第8期上发表了自己的两篇处女作诗歌《走在阳光里》和《晨醒》，之后该年年底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诗歌《关于玫瑰》。这些诗歌显然比较稚嫩，不够深刻。当然也有其历史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在经历了一次大的“震动”之后，大家都心有余悸，不敢过于锋芒毕露，深怕“因言获罪”。但很大程度上这些诗歌的发表标志着她真正的踏入了文坛。在1990年，她27岁，那年她写下了自己的第一首长诗《生命历程的呈现》，开始回溯自己的过去，开始向读者展示一个自我真正的内心世界。诗中“我对自己追求真理与光明的‘人生理想’宣告了‘死亡’与‘空白’”，但冥冥中又有一股力量（也许是来自对文学的热爱，也许是来自之后她所遇见的“神”。）支持着她，让她在负荷重重中等待，“等待门砰然打开，等待肩上一只手的份量。”在她“等待”的期间她在国内各大刊物上发表大量的作品，比如：《人民文学》等刊物发表的《百首无题抒情十行诗》、《中国诗人》发表的诗组《灿烂爱心》、《星星诗刊》发表的《海在近旁》、《作家之门》发表的诗组《女性自白》、《诗刊》发表的《狂草》、《南方文学》发表的《天籁》和《新大陆》发表的长诗《古墓》等，并且在1994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首部个人诗集《大地上浴雪的女人》和1997年的内蒙古出版社出版的首篇个人长篇小说《柔若无骨》等。施玮和她的这些作品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从她的诗集《大地上浴雪的女人》中，可以看到作者极力寻求庄子“天人合一”的境界及其“化身为蝶”的禅意。

1996年年底，厌倦北京生活，想安静写作的施玮以陪读身份与丈夫张骏移居到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在阿尔伯克基，华人稀少，甚至连华文报刊都没有，认识施玮或者对她感兴趣的人几乎没有。她原本是要打算寻找安静之地写作的，但当你查看施玮创作年表时，你会发现自1996年为次年即将出版的长篇小说《柔若无骨》创作长诗《宋词与女人》后，1997年到1998年，在这两年期间她几乎停止了写作。在《世界百位作家谈写作》

一书中，台湾基督徒作家陈映真说：“作家不写作，他的思想也就逐渐停止了活动。”（陈映真. 2004:26）这对一个作家来说是悲哀的。施玮得到了她想要的安静，但她远离了熟悉的语言，远离了熟悉的文字，也失去了作家的光环。“外面的喧哗消失后，我不得不面对自己灵魂的真象，那种虚空、苍白、破败不堪，令我完全地绝望了”。觉得“我自己一直处在‘等死’的状态中。”（施玮. 1999: 28）

“当我最忧伤的时候，我遇见了耶稣。”（施玮. 1999: 28），这是 1999 年初，施玮停笔两年后，她因带中国上海来的老乡到教会的机会，“这也是我第一次不以观光的心态去教堂”（施玮. 1999:30）。在教会看完《耶稣传》一周后的一个晚上，“他在一周后的一个晚上用一串智慧的话语向我的心灵发问。‘你为什么写？’‘你为什么活？’”，“我当时就在这问话面前垮掉了，神以我‘虚无’的人本主义的‘矛’，攻了我来自文化中的、功利的不朽价值观之‘盾’。”（施玮. 1999:30）于是施玮听到神的呼召：“女儿，来！把你的生命和艺术给我”，“对于我的生命，他要我：‘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不可熄灭。’对于艺术，他要我：‘放弃你的审美’”（施玮. 1999: 31）。就这样经历了一连串的“神迹”后，施玮于 1999 年的复活节那天受洗归入主名，成为一名基督徒。

受洗后的施玮，如同耶稣从死里重新复活一般，她有了新的生命，新的思维。她开始重新创作，在神的带领下，她积极地以先锋的姿态进入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创作，试图在中国发起一场“文艺复兴”。从 2001 年到 2005 年，她到美国西南三一神学院学习“圣经研究与神学”硕士，后来又攻读旧约文学博士。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对圣经的学习研究，她发现：“从中国文化本身来理解圣经，并以中国文字语言来表达圣经思想，并不困难。所有的阻隔与困难其实在于我们绕了一个圈，西方地域文化作为载体把圣经基督教思想带给了我们，但同时它却成为中国文化真正与基督真理，与圣经融合的阻碍”。（季玢. 2011:111）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施玮的创作有了丰硕的成果：除了在海内外各个刊物上发表诗歌、小说等各种形式内容的文学作品外，还创作了中国当代首部宗教大型歌诗剧《创世纪》，出版了长篇灵性小说《放逐伊甸》、《红墙白玉兰》、《被呼召的灵魂》，诗集《银笛》、《生命的长吟》、《歌中雅歌》，诗文集《天地馨香》，文学评论《从当代文学现象试析中国作家群的困窘》、《华文基督教文学浅议》、《扩大我们的帐幕》、《“神性写作”上帝呼唤》、《开拓文学的灵性空间》，主编《灵性文学丛书》等等。除此之外，在 2003 年网络文学兴盛之际，施玮建立了网上工作室：施玮文库（www.shiwei.org），继而又开通了命名为“歌中雅歌”的博客等作为自己作品的阵地和

与读者交流的平台。同时，借着自己从小的爱好和在大学里学过的一些基础，施玮开始为自己的长篇小说画插图，最后在甚至开展了多次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情并茂的诗画展。

施玮的生命“经历了梦想的破灭，经历了愤世嫉俗；经历了幽闷自闭，经历了沉迷虚玄；经历了追逐潮流，经历了放纵寻欢。最后，在绝望的死地却遇见真光，得以重生。”

（施玮. 1999:1）重生后的施玮，把自己献上，作为馨香的祭，用自己的笔见证她的信仰，总共发表了 300 万余字的作品，她在文学上的成就也如同挂满了累累果实的葡萄枝。这样的文字事功是《圣经》所教导的，也是神所喜悦的：耶稣在升天前，给他的门徒留下了一个大使命，即：“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圣经. 2008: 94）从此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虔诚的施玮积极写作基督教文学的原因——神给基督徒的使命。

针对中国当代文学日益物质化和世俗化，早在 2006 年，施玮在编辑《灵性文学丛书》时就开始提出“灵性文学”这一概念，给人一个新的价值观与世界观。并在 2008 年 6 月号的《海南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了题为《开拓文学的灵性空间——“灵性文学”的诠释》的文章，对她所提出的这一概念进行更全面的解释。

当我们将“灵性文学”这一概念进行进一步研究时，可以发现它并不是无根之源，无本之木。灵性文学的产生是孕育在“神性写作”的理论以及“第三极”文学运动的基础上的。

由于不满于知识分子写作、后现代主义及回归写作的写作思潮，反对当今写作的垃圾化、娱乐化，在《后现代主义神话的终局——2004' 中国诗界神性写作构想》一文中，刘成提出了自己的新主张：“神性写作”。起初“神性写作”的概念一直停留在诗歌的创作上，直到亚伯拉罕·蝼冢在《神性写作的一般性阐述》一文中才将其范围延伸到小说的创作上。神性写作的特色可以总结为六个字：向上、有益、尖锐。向上，意味着天启、呼召和高度。其中蕴含着信仰、憧憬和理想。这也是神性写作的根本指向。有益意味着正能量，与人类社会价值观相符、与人们日常生活戚戚相关。这主要体现在对诗歌的审美价值上。这也是诗歌创作最低、最实用的指标。尖锐主要是针对自身主体灵魂的黑暗面的与社会上的恶俗的审视与拷打。这与当今的兽性书写形成鲜明的对比。富有积极性的“神性写作”受到了众多学者专家的关注与讨论。于是 2006 年“神性写作者同盟”成立，并且建立了官方论坛：藏象网。亚伯拉罕·蝼冢、陈肖、海上、梦亦非、施玮都是该同盟的成员。同年刘成在网上建立了一个以诗人为主的诗歌论坛与博客圈，“‘第三极’文学运动由此兴起”。之后又创办了网上刊物《第三极文学》和民刊《第三极》。“第三极”作家群落中的核心人物除了刘成本人外，主要还包括施玮、董辑、老巢、十品、寒烟、安琪等。

施玮被邀参与了“神性写作”同盟，她的诗集也被编入了《神性写作》丛书中。她十分反对当代中国文学世俗化与物质化的倾向。不忍心看着“文学”这位自己深爱的“情人”“萎靡与精致的忧郁，徘徊于幽暗的曲折，淤现于肉体的五官，她被物质的碎片割裂，因麻木而‘卖淫’。”但是同时施玮发现他们写作目标模糊、虚幻，创作的文本也缺乏神的真实存在。“我感到他们的追求指向，正如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样，此步于：知有灵、知灵为大美善。却对灵为何？来自何处？灵与肉的关系为何？或茫然无解、或模糊回避。这种对“人学、人论”的模糊，造成了中国文学最多只是回归，从下半身回归上半身，从肉体回归精神，从现代回归古典，却无法超越，更无法整合物质与精神、灵魂与肉体，从而也就只能在形式、风格上变改，无法从根本上省查并垒实根基。”因此施玮开始独树一帜、自立门户，从本身信仰并学习研究的基督教元典《圣经》提出了“灵性文学”。她的这一提法巧妙的避免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神”有“多神”和“乱神”之嫌，也避免了“基督教文学”的教义之争，而着力于在自己的信仰中重新审视、解读人与社会，给读者指出一条通向“天国”的信仰之路。

“灵性文学”的定义

简单的来说“灵性文学”着重一个字，即“灵”，这也是它区别于其他写作形式的主要特征。“灵性文学”中的“灵”取自于《圣经》首章《创世纪》：上帝在第六天根据自己的形象用尘土创造了人，并“将生气吹在他鼻子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圣经.2008:3）这也是人区别于万物的根本。因为在《圣经》中，唯有在创作人的时候向他吹去“生气”。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人有两种实质，即：物质的身体（尘土造的人），其次上帝吹入鼻孔的“生气”。这里的“灵”指的是来自上帝的“生气”，是“圣灵”。而“圣灵”的三个广泛作用的乃是：“启示、救赎和基督徒生活”。（麦格拉斯.2003:223）“启示”主要包括对真理的启示、对上帝存在的启示等。当然也包括对写作的启示，在《提摩太后书》中说道：“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圣经.2008:369）可见《圣经》就是在圣灵的启示下写作完成的。其次是“救赎”，主要包括圣灵对人心理的警醒，责备，避免犯罪，或者犯罪后的悔改。施玮在描述灵性文学的特质时也说：“自省与忏悔表现了灵性文学”（施玮.2007:003）。最后是“基督徒的生活”，“圣灵”是众信徒联合的纽带，保证信徒的信仰生活。因此“灵性文学”的书写乃是“人”在“圣灵”的光照下的写作。这也是施玮在对“灵性文学”进行诠释的三个层面之一，即：“有灵活人的写作”（施玮.2008:6）。这与当今的物质写作、肉体写作形成的鲜明的对比，因此也成为“灵性文学”

的一大特征。与此同时也隐藏了对作者本身信仰的要求。因为这里所说的“灵”乃是来自上帝的“圣灵”。按《圣经》中使徒彼得在《使徒行传》的中的记载：“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须领受所赐的圣灵。”（圣经. 2008: 206）可见在写作前必须领受“圣灵”，而要领受“圣灵”就要“奉耶稣的名受洗”，要“奉耶稣的名受洗”就要“悔改”，简而言之就是“灵性文学”必须是基督徒。“灵性文学”的第二个层面是：“呈现有灵活人的思想与生活”（施玮. 2008:6），对第一层面进一步的解释和延伸。并不是所有“有灵活人”也就是基督徒所写的作品就是“灵性文学”，它还必须一个真的基督徒的思想和生活，也就是给读者一个明确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最后，第三个层面是：“灵性文学启示出神的灵的属性”（施玮. 2008:3）。把过去的“人本写作”转为“神本写作”，最终达到对造物主的大善大美的属性的表达，而不是停留在人性的表达。“灵在人里面，接着人的言说（文字），散发出来的气息与光芒（灵之性）”（施玮. 2007:002）。

为了对“灵性文学”做出更清楚的定义，我们对一下几个概念进行比较区别。

首先是“灵性文学”与“性灵文学”的区别。我们可以先从“灵”这个字进行剖析。施玮所谓的“灵”乃是专指基督教中“圣灵”的“灵”，如上文所述可以说是有一个“舶来品”。而“性灵”中的“灵”乃是完完全全的“中国制造”。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说“性灵所钟”，这是“性灵”一词的首次在古代文论著作中出现。而这里的“灵”指的是人的“灵”。“性灵文学”“强调的是作家主题精神的走向，对应的是言志文学。”（刘忠. 2009:69）而“灵性文学”“批判的是无灵文学，是被道德教化、金钱权势扭曲的文学。”（施玮. 2007:003）

其次是“灵性文学”与“神性写作”的区别。笔者在本章第一节已提到，施玮“灵性文学”的提出乃是基于“神性文学”之上的。“神性文学”中的“神”乃是多神、乱神。也就是根据作者自身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取材，描述自己心中的神的形象。比如神性写作同盟作家镭言在自己的作品《瑜伽》中就选择了佛教密宗的瑜伽作为创作的基调；回族神性写作同盟作家孙谦在他的作品《穆斯林词》则表达的是自己民族的信仰，而施玮发表的作品这是基于基督教信仰上的。

再者是“灵性文学”与“基督教文学”的区别。刘丽霞在《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存在》一书中之处：基督教文学“包括狭义与广义两种含义。狭义的基督教文学，是指包含圣歌（赞美诗）、祷文、宣道文等在内的传统意义上的基督教文学；广义的基督教文学则指基督教著作家基于基督教精神而创作的具有文学要素的一类文学，还有纯文学层面的基督

教文学。”（刘丽霞. 2006:1）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灵性文学”属于广义的基督教文学。

施玮“灵性文学”的文学意义

改革开放至今，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对外的开放，短短的几十年时间，中国文学“走完了世界文学近百年所走过的道路”（王世民. 1997:39），各式各样的文学思潮和写作方式也涌入中国，使中国当代文学呈现出繁荣且多变的面貌，使读者眼花缭乱、应接不暇。而在这繁荣的背后，中国当代文学却面临着“精神与文化的双重困境”。作者对社会伦理道德、价值观的重视不够，而是把重点放在读者的趣味和社会潮流的走向方面。很多作家们忘记了中国文学“文以载道”的传统的责任，因此文学渐渐的走向世俗化、市场化和商业化。

笔者认为作家池莉就是当代文学世俗化的牺牲品。在她的“新写实”小说《烦恼人生》、《你以为你是谁》、《来来往往》、《看着我的眼睛》等作品中都是讲述市井人物在日常琐碎生活中的烦恼、欲望，但很难看到作者的直接或间接地对人生价值观的表达和态度，只是单纯的对事件的发展、性和欲望赤裸裸的描述。她的作品在“题材、人物选择、价值观、文化内涵、作品语言、文章结构以及叙事视角等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世俗化特征”。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文学作品也无一例外的成为了一种“商品”。作者为了迎合读者的一些低级的需求，使得娱乐、媚俗、“恶搞”等大量作品充斥市场。在小说方面“过于追求经济效益，生活准备不足，艺术加工粗放，不注重人物形象塑造和故事情节结构”，从而出现了作品的良莠不齐、类型化突出。

然而在当代文坛上，也存在这一些“文学的良心”，这些具有文学良心的作家站起与当今文学世俗化、商业化进行抗争。女诗人、作家施玮就是这场“文学征战”的一名“女战士”。基督徒身份的她提出了“灵性文学”的概念，提倡写作要注重不仅仅停留于生活层面，更应该注重思想和“灵魂”的思考上。雨果曾经说过“人的生活有两种，一种是短暂的，一种是永久的；一种是尘世的，一种是天国的。”无论是《追逐伊甸》，还是《红墙白玉兰》，抑或《世家美眷》，我们都可以看到作者对人生活、情欲等等的描写，而作者对这些“短暂的”、“尘世的”描写，正是为读者指向一个“永久的”、“天国的”富有正能量的、光明的道路。

基督教文学由于历史原因、社会意识形态原因等等，使其一直处于中国传统文学的边缘地带。施玮“灵性文学”作为广义的基督教文学的提出，引起了学界不少专家学者的关

注，从而也带动了专家、学者们对基督教文学的研究。施玮在基督教文学的成功，一定程度上也给其他基督徒作家在写作方面有了更加指导明确的方向和写作动力；再者给当代中国文学带来多样性、选择性同时对于信仰枯竭的“中国文学之地”来说，它如同一阵甘霖，虽然不能完全解决“干涸”的问题，但是却激起了更多作家对“信仰之甘霖”的寻找，以浇灌“中国文学之地”。

“灵性文学”的社会意义

新中国建立初期至“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传统文化的扫荡，使得中国文化的断层和宗教信仰的缺失。改革开放后80年代末期政治运动对自由化的清除，又使得人们对政治信仰的绝望。改革开放使得当今市场经济的日益蓬勃、物欲横流的社会无论是在宗教信仰还是政治信仰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缺失，取而代之的是“拜金主义”、“拜权主义”、物质至上，享乐第一。信仰的缺失某种程度上等于社会道德规范的缺失，从而出现了种种的社会问题：官场的贪污腐败、钱权交易、良心道德沦丧、人情冷漠、社会丑恶事件频繁等等。根据北京大学法学院白建军教授的统计，自1988年到2007年，“20年来全国犯罪率总体上升趋势明显”（白建军. 2010:148）；“2006年全年自杀97150人，平均每天自杀266人”（何兆熊. 2008:159），同年中国离异夫妻人口为176.5万对。可见人们生活在物质丰裕的年代，同时也是精神空虚的年代。

根据马克思主义“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哲学思想我们可以看到，当今中国人们在物质生得到了饱足了的他们开始踏上了精神需求这一上层建筑，基督教给予了很多精神上的慰藉。根据美国皮尔研究中心2011年的研究报道：中国大陆基督教徒人数为67070000人（Rodney Stark. 2011:12(97)），为中国人数的5%。而在1949年，中国基督徒的人口基数仅仅有70万，短短的几十年里增长了98%；并且基督徒的人数出现了“新三多”的现象，即“青年人多、文化程度高者多、社会地位高者多”。在教会方面出现了“城市精英教会、知识分子教会、老板教会”（邱永辉. 2009:188），这些教会的信徒主要有商人、经理、董事、企业主、教师、大学生、研究生、医生、律师、科学界人士和艺术界人士等。他们拥有相当的社会地位、文化水平、学历、资产，并且很多人士有海外留学、工作经验，他们的思维比较开阔，对社会影响比较大。他们对教会与政府的调节、教会与信徒、非信徒的互动有很大的作用。可以说他们在中国当代教会的发展、扩大中起着重要的

作用。在基督教读物的出版上，在2008年仅圣经的出版就达到380万册。中国的基督教回应着人民精神的需求，蓬勃的发展着。

施玮的“灵性文学”深深的扎根于基督教的信仰之上，乃是“灵魂拯救的文学”。她试图通过她的作品唤醒人们对生命的审视，对基督教的关注，从基督教的信仰上得到精神的慰藉。

基督教有着它自己的信仰、价值和思想文化体系，对中国在社会发展进程有很大的作用。

首先，“摩西十诫”对中国社会的意义。“摩西十诫”是上帝通过摩西在西乃山颁布给以色列人民的诫命，也是当代基督徒所遵守的诫命。其中第一至第三条关于人与神的关系；第四至十条是关于人与人的关系，即人与社会的关系。四至十条的主要内容是：孝敬父母、不杀人、不奸淫、不偷盗、不做假见证、不贪恋别人的财物。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类似的提法，比如《二十四孝》中提到的对父母长辈的孝道，但是中国文化在诸多运动中已被破坏殆尽，其二，这些文化只停留在道德程度上，而“摩西十诫”则提升到宗教的高度上。对道德的约束力是根据个人的觉悟和素质决定的，是自我选择的；而宗教的约束力则对广泛的信徒有普遍的约束力。“摩西十诫”对中国犯罪、自杀、还有家庭婚姻都有一定的约束作用，可以成为中国法律的辅助工具结局中国社会、家庭多方面的问题。

从施玮的长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文人戴航、李亚、赵溟他们各自有着自己的罪，戴航对父亲的仇恨；李亚对父亲的离弃、做小白脸、嫖妓；赵溟对妻子和孩子的自私、清高自傲；秦小小对婚姻的背叛；陆氏姐妹对情欲、物欲的追求。他们的这些罪导致了他们在精神上得不到解脱，造成了对周边人甚至社会的巨大影响。戴航对父亲的仇恨，首先导致自己对婚姻的不信任，不敢走入婚姻殿堂；其次也给父亲在情感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最终孤独终老，类似的还有李亚对自己父亲的离弃。在基督信仰中这都是违背了“摩西十诫”中“孝敬父母”这一戒。“孝敬父母”这一戒是紧跟前面神与人的三条诫命，是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第一条诫命。并且这条诫命也是“摩西十诫”中唯一带应允的诫命，神允诺“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圣经.2008:337），即孝敬父母，神就祝福，得长命百岁。同时李亚在“性”上的放荡，使得他自己最后的了性病；秦小小的婚外情造成了情人杨修平家庭几乎破裂；陆文荫贪纵情欲，使得情人薛云飞被人枪杀。这与“摩西十诫”中“不可奸淫”一戒相违背。在《圣经》中“奸淫”的定义是“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圣经.2008:8）而且“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圣经.2008:392）。基督徒认为婚姻是神设立的，是神圣应当

尊重的。所有禁止婚前性行为，以及婚后有第三者和离婚的行为。这样的观念有助于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婚前性行为、未婚先孕、包二奶、离婚、单亲家庭等社会现象，同时也降低了社会性骚扰、性侵等诸多犯罪现象。

其次，基督教中爱的精神对中国社会的意义。当今中国社会人情冷漠、见死不救，家人之间亲情暗淡、认钱不认人，同事朋友之间友情稀疏、唯利是图、没有原则。“爱”是传统中国文化避而不谈的话题，但它却是基督教的核心和闪光点。基督教是爱的宗教，救赎是贯穿圣经的一个重要主题，在《圣经·约翰福音》中说道：“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圣经.2008:361），神因着爱给世人赐下了救赎，耶稣基督因为爱走向了十字架，因此基督徒要彼此相爱，爱人如己。在《圣经》中对爱的阐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圣经.2008:299）。其里面包含着仁爱、谦虚、和平、公义、耻辱、宽容等。

2005年中国政府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特征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胡锦涛.2005:20）。“基督教的和谐理念集中在圣经中对‘和好’、‘和睦’、‘和平’的论述中”。而在《圣经》在对基督徒的教导中有与“公平正义”这一特征相同的观点：“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诚信友爱”对应的则是“摩西十诫”中的“不做假见证”和耶稣所倡导的“爱人如己”；基督教中倡导的“使人和睦”、“顺从”的教导则与“安定有序”相对应。从上面的比较中可以看到基督教《圣经》中的教导和中国所倡导的构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很多相同、相似的地方。因此基督教的信仰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构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作家施玮的小说始终不渝地站在基督教的角度不断在向人们揭示真爱、宽恕和人生的价值、真意，不断地告诉人们“我（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施玮的现象的出现也应该引起我们对信仰以及生命的思考。无论我们是否同意基督教的观点和立场，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宗教对人类的教化和对精神慰藉的强大作用，同时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和社会道德秩序的维护、和谐社会的建设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参考文献

-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 (2008). 圣经. 上海: 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社.
- 季玢. (2010). 野地里的百合花.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施玮. (1997). 柔若无骨.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施玮. (1999). 生命的长吟.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 陈映真. (2004). 世界百位作家谈写作. 延吉: 延边出版社.
- 王世民. (1997). 精神与文化的双重困境——试论中国当代文学的趋向. 山西师范大学学报.
- 余卉. (2009). 论池莉小说世俗化的审美风格.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 张炯. (2004). 攀向高峰的艰难. 文学评论.
- 法]雨果, 柳鸣九译. (1980). 雨果论文学.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 白建军. (2010). 从中国犯罪率数据看罪因、罪行与刑罚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
- 何兆熊. (2008). 中国自杀率高不高?——我说不高!. 学术论坛.
- 付红梅, 李湘妹. (2008). 当代中国的离婚态势分析和婚姻展望. 西北人口.
- 邱永辉. (2009). “中国基督教研究”的研究报告——中国宗教报告(2009).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段琦, 唐晓峰. (2009). 2008年中国基督教现状及研究——中国宗教报告(2009).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杨剑龙. (2007). 灵魂拯救的文学——论灵性文学小说集《新城路100号》.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